

# 社区开发与移民过程

——对昌五社区的考察

张 汝 立

**Abstract:** By the research to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immigration in Changwu community, the author reveals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the mixed immigration community in northeast inland rural area in China. The special perspective —— research to the name of the natural village —— is applied to this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 name of the natural village”, as the record of the history of the immigration community, not only reflects the location structural situation of the community, but also shows profound economic and cultural meaning. In addition, adopting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author compares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immigration in northwest inland rural area with those of w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same period, from which we could see tha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aspects of immigration motivation, quality of the immigrants, institution model and the changing rate from peasants to urban citizen. It is this kind of difference that enlarges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communities.

## 一、引 言

在人口迁移理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迁移规律理论”(Kavenstein)、“推拉理论”(Evere S. Lee)、“二元经济理论”(阿瑟·刘易斯,1989)、“成本—效益理论”(T. W. 舒尔茨,1990)、“流动转变理论”(杨云彦,1994)等,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而提出的,即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城市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将不断由落后的农村地区迁往发达的城市地区。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上述假设是很容易得到验证的,并且,它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颇具解释力。然而,将这一假设用于解释中国人口迁移问题时还应考虑到中国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中国从建国前以人口的自发迁移为主,到建国后以人口的计划迁移为主,再到“文革”结束后恢复以人口的自发迁移为主的发展变化规律显然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始终以自发迁移为主的状况。另外,由于中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使得部分地区直到19世纪后半叶,仍然处于未开发状态,如东北的大部分地区,而向东北地区的人口迁移并不表现为由落后的农村地区向发达的城市地区转移那样一种规律,而是表现为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向另一个同样状况的农村地区的水平迁移,迁移的动机只是为了能吃饱饭,较少有理性选择的特征。中国学者关于人口迁移的研究多集中于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杨云彦,1994;石方,1990)探讨。本文将以历史社会学的视角,通过对一个具体社区开发与移民过程的动态考察,增加一些对中国尤其是对东北内陆农村地区社区发展问题的认识。本

文重点考察的昌五社区是黑龙江省肇东市西部一个中心型集镇,东距肇东市区 33 公里,东南距哈尔滨市 90 公里,全境面积 139 平方公里,包括常住人口 4.2 万人(据 1998 年统计)。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为文献法,辅之以访谈法和观察法。

## 二、“五方杂处”移民社区的形成

### 1. 昌五的开发者——“闯关东”的人们

1861 年清政府对东北地区实行开禁放垦政策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山东、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向黑龙江省涌入大批垦民。这些垦民都是在本地水旱灾害严重、土地匮乏、连年战乱不已无法生存下去的情况下,为了能吃口饭和生存下去铤而走险“闯关东”的。同关内相比,黑龙江地广人稀,1907 年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为 3.1 人。这里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关内移民较容易获得土地;由于黑龙江地域有巨大的比较资源优势,因此它吸引了大批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关内农民。《黑山白水录》这样描述了 19 世纪末移民的状况:“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只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其寝食者皆山东移民”(孙占文,1983)。20 世纪初,当清政府向中东铁路两旁“三蒙之荒”招民垦荒的时候,涌向昌五地区的移民也大体是上述情景。我们在昌五调查时,无论是在街上随便同一个老乡攀谈,还是在普通农民或村镇干部家里唠家常,只要是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都会向你讲述一个“我爷爷”、“我爹爹”领着全家闯关东,到昌五落脚的辛酸故事。有个老者讲述他爹爹带着全家 5 口人,挑着挑子一路要饭从山东省来到昌五。当时他不满两岁的弟弟坐在挑筐里,由爹爹挑着,他和妈妈背着包在后面跟着走,就连年仅 5 岁的妹妹也得徒步行走,结果累死在路上……有的说,他老家在河南,民国初年,父亲卖掉了家中仅有的房子,带着奶奶、叔叔和他,一路步行三个月走到天津卫,找到在那里拉大船饿得皮包骨的祖父,挤上北去的火车到哈尔滨,然后又从哈尔滨步行到昌五,投奔先期到这里落脚的舅爷……

到目前,我们已经无法查到自本世纪初以来现今昌五地区移民人口变动的具体数字了,但当时昌五是移民行政管理的中心地带,我们可以从肇东全县的人口变动数字中透视出昌五地区的移民状况。

如果说 1901 年以前“三肇”地区(郭尔罗斯后旗)人烟稀少,昌五地区人迹罕至的话,那么从我们能查到的资料看,到 1912 年,现今肇东市范围内的人口达 75113 人;1914 年达 133316 人,其中当年人口自然增长仅为 1174 人,而机械增长人口高达 19685 人,也就是说一年中迁入人口近 2 万人,机械增长率为 147.66%,机械增长人口是自然增长人口的 16.77 倍。1929 年全县人口 155753 人,其中当年机械增长人口 5183 人(肇东县志办,1985)。

到日伪统治的满州国时期,人口增减波动幅度较大。比如,1932 年全县人口 19.9 万人,1937 年下降到 15.8 万人,1939 年又上升到 19.3 万人,1944 年又下降到 15 万人。这种起落状况反映了当时日本侵略者军事统治的严酷。大量抓劳工,要勤劳俸士、募国兵,农民生活状况不稳,人口流动量大。1936 年人口为 16 万,比 1934 年少 2.3 万人;1941 年人口达 21.3 万,同年机械增长 1.14 万人(肇东县志办,1985)。

### 2. 性别比失衡的移民社会

肇东县的人口多是移民,特别是放垦之初,由于条件艰苦,所以先来的移民多为“壮健单

夫”，从整个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性别比例中可以看到这点。据 1927 年（民国十六年）旧满铁研究所调查，在关内向东北地区的移民中，男性占 82.70%，女性占 17.30%；又据 1935 年东亚经济研究所统计，迁往东北的移民中，男性为 91.7%，女性仅占 8.3%（李德滨、石方，1987）。这也表明了肇东县作为移民社区性别比极高的特点。据 20 世纪 30 年代编写的肇东县概况等材料记载，在 1912 年全县 75113 的人口中，男性为 42348 人，女性为 32765 人，如果以女性指数为 100，那么性别比为 129.2；到 1914 年全县人口猛增至 133316 人，性别比更高得惊人，当年男性为 83641 人，女性仅为 49757 人，性别比达 168.1；1915 年性别比为 127。这种高性别比正反映了人们对命运难以把握和归属未定的移民社会的特点。

当年，黑龙江省越是新开发的地区性别比失调的状况就越严重。所以，在移民开发时期，黑龙江地区出现了由南到北性别比越来越高的状况。从肇东看，30 年代性别比例失调的状况比开发初期缓和得多，但性别比仍偏高。1934 年性别比为 112.25，1936 年为 118.60，这种移民社会高性别比的状况对黑龙江省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都带来不少的影响。

### 3. 移民迁出地构成

昌五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关内和辽、吉等省，汉族居多。同时也有本地的满族、蒙族以及外迁来的回族杂居其中。1934 年肇东县志是这样记载的：“本县开辟之初，居民多由他处移来，除燕鲁人外，余均吉林奉天迁来者……”移民大多来自山东省，特别是山东西部地区。其他则来自关内其他省份如河北、河南、山东，也有少量的南方人。由于早在 20 世纪初期以前就有大批关内移民闯关东，其中一些移民已在奉天（今辽宁省）、吉林省落脚谋生。落脚谋生后，部分家庭的生活境遇不太好，所以“三肇”地区放荒时，已在辽宁、吉林一带居住年份不等的农民继续北上，有的落到昌五定居下来，由于他们直接来自吉林、辽宁省，所以把他们称为吉林人、辽宁人，但实际上在此之前他们的原籍也多是山东或河北等省人。

来自不同地区的人风俗不同，生活习惯也不同，但却能很好地相处，并在共处一方的过程中彼此都有了戏称：人们称山东人为“山东棒子”，称山西人为“老西子”，称乐亭、昌黎一带的河北人为“老坦儿”，称辽宁人为“辽宁杆子”，称本地汉族人为“臭糜子”，而江淮流域以南的人则被称为“南蛮子”。这些“山东棒子”、“老西子”、“老坦儿”、“辽宁杆子”、“臭糜子”、“南蛮子”们，加上本地的蒙、满等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社区。今天的“黑龙江人”、“昌五人”大多是这些移民先辈们的子孙，以及移民先辈和本地少数民族通婚的后代。由于移民中以山东人为主体的，加之这里的人们还有一个习惯，把包括太行山以东的河南、河北人（昌黎、乐亭除外）也称为或自称为“山东人”，因此，“山东老乡”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用来表述为昌五人的来源。今天，正是这些在黑土地上繁衍的“山东老乡”的后代们，成为这片土地发展的希望所在。

## 三、屯名：移民开发史的记录

### 1. 屯名的历史印记

以往昌五社区社会生活的具体情景除老人们的口头传述外，现已没有多少文字记载。但是当年开荒者的活动印记却通过自然屯的名称清晰地保留下来。

黑龙江省的“屯”相当于关内各地的“庄”、“村”、“寨”、“堡”、“营”、“井”等。这些“屯”作为农民生活的聚落体，现在称为自然村。一般来说，昌五镇的自然村规模为数十户，而一个行政

村包括几个这样的自然村。

地名是人们对地形、地物共同约定的一种语言代号。地名的命名,是在人类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它与人类的活动领域、文化风貌和居住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考察一下昌五镇那些通过人们共同约定而形成的屯名的来历及其区位分布特点,可以从一个特定角度向我们提供许多反映开发时期昌五人活动踪迹和社区区位结构方面的信息。

昌五镇现有的18个行政村的村名,除集镇内的一、二、三、四街的村名外,大部分是沿袭50年代成立合作社时起的社名,多用昌盛、昌平、红星、福利、向前、会心等词,这反映了50年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在昌五镇的18个行政村中,集镇内的4个街村农户非同农户“插花”居住,下面没有自然村,其余的14个行政村都辖有自然村,其屯名大多是移民开发时期形成的,这些屯名的形成同昌五的开发史一样长。

昌五镇坐落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数十个自然村(屯)以集镇为中心,星罗棋布地撒落在它的周围。昌五镇正式统计的自然村数为54个,而实际屯数又不断有调整变化。同时在屯名形成过程中,一个屯子往往不止有一个屯名,这种多名的情况也属于我们考察的范围。

现把屯名的形成情况加以整理,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昌五镇屯名绝大多数是本世纪初移民开发时期形成的。有的虽然有新屯名,但老屯名却是那个时期形成的。在我们所归纳的8种名称来源中,前6种均反映了开荒占草时期的人文、地物特征,其命名方式如下:

(1)以开荒经营者的姓氏命名。这种命名方式较多,如潘家屯、盖家屯等等。这种以姓氏命名的方式从文化源流上看显然是移民者从关内带过来的,外在形态同关内的“张家庄”、“李家庄”之类的命名方式是一致的,但如果从名称的来源角度加以考察,却可以从中透视出不同的信息。

关内以姓氏命名的庄名或寨名多是同姓大家族历代沿续居住的聚落体,不少村庄同姓家族都有几十辈的居住史。而昌五镇以姓氏命名的屯子则是以最早在这里开荒经营的一个家庭的姓氏命名的,以后又陆续聚集了不少来自各省的杂姓人家,其中多数农户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他们往往成了最早开发经营者的佃户。如果有两个屯子开荒经营者的姓氏相同,为了相互区别,则在前面冠以方位词,如“东黄家屯”、“西黄家屯”;有的在开荒占草时只有一户人家,则起名“孤陈家屯”。又如这个屯子里同姓的人家较多,则在姓氏前冠以“窝子”、“半拉”之类的形容词,即一窝子姓李的或有一半姓刘的。正因为移民社区是杂姓而居的,所以一个屯子里的同姓农户多反而成为稀奇的事,并反映到屯名上。这种屯名明显带上了开荒占草的历史痕迹。以其姓氏命名的最早开发经营者,土地改革时期多数被划为地主、富农。有趣的是,土改时期在昌五镇街道上有几个新形成的聚落体,当时没有屯名,土改工作队就以那个聚落体中户数最多的某一姓氏命名为林家屯、何家屯等。这也是沿袭了传统的命名法。

(2)以开荒经营者的姓名(或外号)命名。这类的命名方式最多。在关内各地也有以姓名命名的庄、村名,但多为历史名人,其中包括年代久远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其数量要比“张家庄”、“李家庄”之类的以家族姓氏命名者少得多。而在昌五镇以至整个黑龙江省的不少屯名则是以最早开荒经营者个人的名字命名的。之所以如此,同这个屯有知名度的不是一个家族,而是开荒经营者个人有关。有的由于本人的外号比名字更为人所知,于是就以外号命名屯名,如“李善人屯”、“邱大抓子屯”、“张老虎屯”。有趣的是“李善人屯”是该屯的正式名称,但它还有个个别名叫“李格子屯”。外号叫“李格子”的人是“李善人”的后代,“格子”(ge zeri)是东北

表 1

昌五镇的屯(自然村)名及其来源

序号	屯名来源	移民开发时期形成的屯名	建国后形成的屯名
1	以开荒经营者姓氏命名	王家屯、盖家屯、祝家屯、宛家屯、姜家屯、(又称四井子屯)、潘家屯(又称兽医桩子屯)、孤陈家屯、东黄家屯、西黄家屯、半拉刘家屯(又称刘明义屯)、窝子李屯(又称三撮房屯)	林家屯(又称辣椒屯)、何家屯、李格子屯
2	以开荒经营者姓氏或外号命名	张姜屯、李福轩屯(又称农场屯)、姜成业屯(又称联合屯)、王洪珍屯(又称万宝屯)、前付贵屯、后付贵屯、刘景尧屯(又称后双合屯)、刘兴汉屯、张振屯、徐发屯、祝国正屯、李善人屯(又称李格子屯)、王春林屯、戴珠屯(又称高家小铺屯)、邢九江屯、张宝山屯、刘明义屯(又称半拉刘家屯)、邱大抓子屯(又称巨发屯)、赵文财屯(又称赵老虎屯)、张傻子屯(1958年后该屯取消)	梁成西屯
3	以建筑物或其他人工标记命名	三撮房屯(又称窝子李屯)、四撮房屯、东腰窝棚屯、西腰窝棚屯、周家窝棚屯、祁四窝棚屯、大草房屯、爬蛋窝棚屯(又称小六井子屯)、南官房屯、北官房屯、东官房屯、东北官房屯、东南官房屯	微波屯(非正式统计屯数之内)
4	以井字命名	大四井子屯、小四井子屯、四井子屯(又称姜家屯)、五井子屯、大六井字屯(又称爬蛋窝棚屯)	
5	以店铺、手工业作坊或场地命名	齐炮仗铺屯(又称前双合屯)、高家小铺屯(又称戴珠屯)、小窑屯	
6	以地形、地貌、区位、立屯户数命名	拧腕屯(又称太平山屯)、三大家屯、独一处屯、二龙屯	
7	以古遗址或牲畜命名	房身屯、桃花马子屯(又称新立屯)	
8	其他		农场屯(又称李福轩屯)、联合屯(又称姜成业屯)、新立屯(又称桃花马子屯)

地方土语,是说一个人的性格古怪,可能是此人的性格太特殊了,以致压倒了祖上的影响,所以现在人们多称该屯为“李格子屯”。李格子活了 80 多岁,前几年才去世。以外号命名屯名,昌五镇并不是一个例外,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昌五镇的地图移向邻近乡镇,还会找到“于大驾子屯”、“秧歌李屯”、“王半拉子屯”等等。以人的外号命名体现了以记忆深刻的事物命名的成因特点,这种成因不仅体现在人身上,而且也“惠及”到牲畜。比如,新立屯的又一名称为“桃花马子屯”。这是因一户姓陶的农户养了一匹有花纹的马而得名。这种命名方法也明显打上了移民开发时期的印记,并成为有地方人文特色的一种命名方式。

(3)以最早出现的建筑物或人工标记命名。这也是命名方式中较多的一种。所凭借命名的建筑物或人工标记突出反映了开荒、移民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这类名称又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官”房命名。前面已经说过,20 世纪初,昌五地区的放荒招垦是由清政府“官方”实施的。当时为了便于管理和维护治安,除构筑土城池外,还在城外四周由官方零散地修了一些房舍,由于这些房舍出现较早,以后在这些房舍所在地发展成了屯子,于是就以“官”房的方位命名屯名,如“北官房”、“东北官房”、“东南官房”等等。第二类是以开荒经营者最早

修建的房舍命名,如“三撮房”、“四撮房”、“腰窝棚”、“大草房”等。其中的三撮房、四撮房前面的数词代表最早的户数。如西联村的“四撮房屯”就是最早因有王、刘、阎、赵四家在这里盖了房子而得名。而称之为“窝棚”的则是一种用木棍支起来的十分简陋的房舍,反映出开发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之低。有一个屯名在“窝棚”前面还加上了“爬蛋”二字,显然是形容“窝棚”的低矮和要倒了的样子。有的还把以姓氏或名字命名的方式同以建筑物命名的方式结合起来,如“祁四窝棚屯”、“周家窝棚屯”。与“窝棚”、“大草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以现代建筑物命名的新屯名,这就是东联村的“微波屯”,其名称来源于在东联村一个新聚落体中高耸起的微波通讯塔,该村的村长把通讯塔所在地称之为“微波屯”,以后这个名字就叫开了。该屯虽未被列入正式统计数字之内,但它象征着在传统的农村社区已生长出了现代因素。改革开放以来还有一些自然村得了新名。比如会心村的林家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来,以从事种植辣椒的专业化生产而著名,因此人们又称该屯为“辣椒屯”。第三类是以各种人工标记命名的屯名。如“小窑屯”、“兽医桩子屯”、“高家小铺屯”等等。

(4)以“井”字命名。这类的屯名有四井子屯、大四井子屯、小四井子屯、大六井子屯、小六井子屯等等,这正是当年划井放荒的历史遗存,其中一些屯子在后来又有了别名。

(5)以屯型、地貌、区位和立屯时的户数命名。属于这种情况的共4个,即拧腕屯、独一处屯、三大家屯、二龙屯。其中“三大家屯”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三大家屯”名是因开荒占草时有三户人家而得名,这三户人家分别姓郎、刁、任,用谐音念起来就是“狼叼人”。说来也巧,姓任的这户人家的日子总也不如姓郎的人家过得好,于是人们认为是这两姓相“克”,后来姓任的这家就搬到外屯去住了。

上面这些自然屯名都同开荒移民时期的活动有关,但巨宝村的房身屯例外。这是根据发现早于移民开荒时期的住房遗址而起的屯名。

## 2. 屯名的经济、文化内涵

从以上对昌五镇屯名来源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屯名本身遗留的人文资料,生动地记录了昌五移民开荒时期的经济、文化状况。例如,因建筑物“窝棚”、“草房”等而得名的屯名,反映了当时住房条件之恶劣和生活条件之艰苦;以小手工业作坊、铺面或场地而定名的屯名(如齐炮仗铺屯、高家小铺屯、小窑屯、兽医桩子屯)又反映了当时小生产自然经济的经济结构状况和生产水平。

再如,地名是人们凭借一定的文化水平而约定俗成的,因此人们给屯子起什么名字,也反映了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特点,上述屯名的一个总特点是“粗俗”,但又不乏生动幽默,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民俗文化的产物。有的屯名就是当初人们在说粗话取乐中起出来的。如屯子里的房基立歪了,就叫“拧腕屯”;看到低矮要倒的房舍就起名叫“爬蛋窝棚”等等。可以想见,在这些说话取乐的东北农民中有很多是赵本山式的农民幽默家。说到屯名,我们还可以想见,现在保留下来的屯名还是经过在流传中筛选、过滤了的,在流传过程中会有更粗俗的屯名消失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昌五城街里的街名和胡同名称却起得相当文雅,带有某种书卷气。如昌五城南北大街叫“昌明街”、“拱辰街”,东西大街叫“紫气街”、“升平街”,其他街道和胡同的名称为“竹苞街”、“芝兰街”、“善政街”、“兴教胡同”、“盛智胡同”等等。这是因为昌五城街里的街道、胡同都是有文化的官员们居住的地方,名称是他们起的。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在昌五地区的开发过程中,也带过来一些中原的“土”文化。

## 3. “聚屯而居”与社区区位结构

移民开发时期昌五镇自然村(屯)的形成和昌五城的修建,大体确立了今天昌五社区区位结构的雏型。

前面已经说过,昌五城是在放荒招垦初期作为区域行政管理和军事治安防务中心而修建的,与此同时在它的周围陆续出现了一个个垦民的定居点。从关内各地涌入的移民采取了“聚屯而居”的居住模式。之所以“聚屯而居”是由当时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因为大多数穷苦的移民需要租种荒地经营者即“领户”交纳荒价(每垧价银二两一钱)所领种的土地。在初期,他们还要利用别人的牲畜和生产用具,在经济上形成依赖和依附的关系。同时,乡亲、屯邻之间也需要相互照顾,因为孤立的一户无法解决道路、饮水和匪盗出没下的安全等问题。所以,采取“聚屯而居”的方式是必然的。

昌五社区坐落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境内无山川河流,移民涌入后,主要是开荒种地,从事粮食等种植业生产。这种平原地貌加上小农生产方式就决定了自然屯的分布呈星罗棋布状。屯与屯之间的距离也是有内在规律可寻的:农田离农户房舍的距离一般在2—3华里,这是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耕作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所允许的合理距离。因此自然屯的分布打破了划开放荒时所规划的6华里见方立一个屯基的设想。由于各屯都是由从事自给自足生产的小农户所组成的,所以屯与屯的同质性极强,他们之间较少有生产、生活上的交往活动,相互之间呈封闭状态,屯与屯之间很少有便于行车的道路,不少屯子间仅有“毛毛道”相通,主要是走亲戚走出来的。

但是封闭、自给自足的聚落体,在经济上也有进行集市贸易的需要,所以昌五城这个开荒行政管理中心,凭借其交通条件,很快发展成为该地域内最大的集镇,成为周围地区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其辐射面当时就远远超出了现在昌五镇的范围。这样,各个屯都要进城换锄头、镰刀、铁犁、鞭梢等生产用具和盐、布匹、铁锅、瓦盆、饭碗等生活用品,从而形成了以昌五镇为中心同周围散在的自然屯之间发生物质和人口互动关系的区位结构格局,这一社区区位格局一直保持至今。当然,那时从事自给自足小生产的农民平日里也是很少有进城的需要和条件的,农户生产的商品率很低,能够购买的物品也有限。从道路情况看,各屯和集镇之间的土路在春、夏、秋季的不少时间都是泥泞不堪,很难走车,雨季人行都困难,只是冬季来临道路封冻后才便于行车,那时也正是打完粮后,农民手头有点粮食想卖掉,又到了年节,需要买年货,所以才进城。

至今,处于偏远地区的一些农民一年之中也较少走出村屯。1991年春节前夕,我们在昌五街里遇到一位不到40岁的外乡农民,我们问他今年出村上过几次街里。他说是两次,一次去安达市街里,一次是这回到昌五城给老丈人送点葵花籽,顺便买点东西。在他眼里,昌五城是天底下最繁华的地方。他感到最奇怪的是,昌五城里居然还有专人扫大街打扫卫生。

#### 四、社区开发的国际比较

以上是我们运用文献资料对20世纪初昌五社区移民开发过程所做的近距离描述。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昌五这一移民社区发展的起点和特点呢?要识庐山真面貌,尚需置身庐山“外”。为此,我们把镜头拉得远一些,使观察的角度更开阔一些,把昌五社区乃至黑龙江省和东北地区的移民开发,同世界上其他地区相近时期的移民开发过程做一比较。

黑龙江地区从远古时代起居住的各个民族就同中原地区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是中华民族

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关内各省人口的大批涌入和开发则是 1861 年以后的事, 至今只有 130 多年的历史。这同美国西部、日本北海道的移民开发时间相差不多, 同加拿大、澳大利亚一些地区的开发也差不多同时。昌五地区具体移民社会的形成还要晚些, 只有不到 100 年的历史。在中国这样一个经历数千年国土开发、资源已受到巨大消耗和破坏的国度, 一个拥有巨大资源优势的晚开发地区, 本应是历史的幸运儿, 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但经过一个世纪以后, 我们的这些晚开发地区同上述国家的晚开发地区之间在发展水平上形成了巨大的差距。为什么差不多同时开发的地区, 在发展中却形成很大差距呢? 我们还是就移民开发的起点做一下国际比较。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资料, 我们把昌五地区同美国西部的开发做了如下方面的比较:

### 1. 移民素质和迁移动机比较

昌五镇的移民除少数小商业经营活动者、小手工业生产者和少得可怜的文化人外, 绝大多数是来自山东西部以及华北其他贫困地区破了产、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农民, “闯关东”是一种被迫的谋生行为, 目的就是为有口饭吃, 不致于饿死。他们不但贫困, 而且基本上都是文盲。这同美国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向西部移民的情景是很不相同的。

美国历史学家贝阿德·斯蒂尔根据美国当年西部开发者的日记、书信编写了《美国西部开发纪实》一书, 生动地再现了当时西部移民开发的情景。从大量纪实性资料中可以看出, 那些涌向美国西部的移民多是来自东部地区各行各业的探险者、牛仔, 以及来自欧洲各地不满旧秩序而来新大陆谋求发展的人们。他们怀着对财富的渴望, 甚至不惜以对印第安人的血腥屠杀去追求机遇和幸福。书中编录了当时一位旅美欧洲人的日记:

美国人冲向前去获得命运赠给他们的大量战利品, 其贪得无厌, 实难形容, 他们毫不畏惧地迎着印第安人的箭和森林的阻挠向前追求; 不在乎森林的寂静, 不因猛兽的袭击而停步; 因为激励他们向前的不仅是对生活的热爱, 而且是一种强烈得多的热情。在他们面前是无边无际的大陆, 他们奋力前进好像是受到时间的催促, 惟恐找不到用武之地……从建立俄亥俄州以后, 还只过去了 50 年……俄亥俄州的大部分居民并非出生于该地; 州首府只建了 30 年, 他们的土地上仍有大片没有开垦的田地; 然而俄亥俄的居民已西迁, 转而去到伊利诺依州的富饶大平原的大多数移民都是俄亥俄州的老百姓。这些人离开原先的地方是要改善条件; 他们离开定居的地方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寻求好运的欲望已在他们心中成了一种强烈、不停歇的热情, 得到的越多, 这种热情就越强烈……移民在刚开始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生计手段, 很快就成了一种碰运气的做法, 他们穿的是各个城市的衣服, 说的是各个城市的语言; 他们了解过去, 对未来充满好奇, 而且对现在进行辩论, 总之, 他们是高度文明的人, 愿意暂住在偏僻的森林地带, 带着圣经、斧子和纸夹的报纸进入新大陆的荒野……他们大多没有很多财富, 大多很聪明, 都想发财致富……(贝阿德·斯蒂尔, 1988)

这些唱着《翻过重重山啊, 弟兄们》的歌, 向西挺进的移民, 同我们前面引用的《黑山白水录》中所描述的闯关东的关内移民情形, 在迁移动机、移民素质上形成多么大的反差啊!

### 2. 移民社区的社会制度模式比较

如上所述, 昌五的移民社区所建立的是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度, 是华北地区小农经济制度的复制。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和消费单位, 每个村屯也是相对隔绝的, 它们同昌五集镇虽仅有用少量的农产品换取简单农具及生活日用品的交换关系, 但仍是属于自给自足经济的, 是自然经济的表现形式和组成部分。需要提及的是, 在清政府放荒招垦

过程中,土地由蒙古王公的世袭转入垦民手中,所有制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清政府放垦是以筹款为宗旨,大户报领土地的数量不限,他们包揽大块荒地,或招佃农,或收取小户押租,因而放荒过程就是封建土地关系形成的过程。而在20世纪初依然复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就已远远落后于全球的发展了。另外,由于每个农户力量单薄,占有的土地数量有限,因而必然采取“聚屯而居”的居住模式。

在美国西部所建立起的移民社会却不采取“聚屯而居”的居住模式,而是以每个移民家庭为单位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定居点。各定居点的家庭之间都保持较大距离,在空间上相互分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地价便宜,每个定居者都不顾自己的耕作能力想方设法得到最大的庄园与农场。但是这种空间上的隔离,只是具有过渡的和相对的性质。因为这种孤立的农场或庄园,很快就通过发展交通网和通讯服务以及大量的中介机构(如经纪人、银行、运输、仓库、市场机构等),而“聚合扩大成越来越分化、独立性较强的地方性或全国性复合体”(裘德·马特拉斯,1988)。如果说每个家庭庄园或农场是孤立存在的话,那么村庄居住的则不是从事农业的人口,而是为农业服务的非农业人口。然后又通过城镇进行农产品加工或向远近的消费者经销,把产品打入国内国际市场。因此,美国西部垦区从一开始农业生产就被置于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之中,通过市场把一个个家庭庄园农场联为一个整体。“美国乡村本身从来都不是自给自足的单位,而是包括农民、村民以及属于外来商品与外来服务的市场和货源在内的乡村经济的一部分”;“在美国的乡下,尽管生产自给的农业到处可见,但却从未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只不过是通讯、交通运输和制度发展之间的一种过渡阶段”,“从来都是高度分化、独立性很强的市场经济”(裘德·马特拉斯,1988)。

### 3. 人口流动和城乡人口转换率比较

我们的调查表明,昌五作为一个移民社区,人口定居之后地域性的人口流动就很少了。今天的昌五人大多数是上几代昌五社区移民的后代。如果说在移民初期社区人口具有“五方杂处”的人口异质性特点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同质化了,在20世纪很长的时期中,昌五经济呈缓慢发展状态,特别是80年代以前,不但人口的地域流动很少,而且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换率也很低。

而美国,在19世纪的任何一个乡村地区,人口的流动率和转换率都是很高的。有些移民在一个地方只作短暂逗留,便又迁往更有希望的地方去,“很多地方只有极少数移民作永久定居。因此,许多地区的人口都是不同的民族、人种和语言群体的大杂烩”(裘德·马特拉斯,1988)。在美国,不仅州际之间人口流动率高,而且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换率也很高。据统计,在1870年,全国从事非农职业的人数占总人口的47%,到了1920年已达73%。这正是工业化引起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 五、简短的结论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与社区开发和移民过程的无计划及无序性相关联,昌五社区的开发者——“闯关东”的人们,来自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多个省份,形成了“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虽然他们的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各异,行为模式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这些“闯关东”的人们大多是来自社会底层低素质的穷苦农民,缺乏中原及华北等地区“土”的风尚,再加上移民社会的男

性明显多于女性的性别比失调等诸多原因,使东北地区的移民形成了较少受束缚的豪放无羁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对东北地区尤其是黑龙江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

2. 屯名作为人们对地形、地物共同约定的一种语言代码,是在人类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它与人类的活动领域、文化风貌和居住环境有密切关系,通过对屯名的考查不仅可以从一个特定角度向我们提供许多反映在社区开发过程中移民活动的踪迹和社区区位结构方面的大量信息,更重要的是可以透视出丰富的经济与文化内涵。

3. 包括昌五社区在内的我国东北农村地区与同属晚开发的美国西部地区相比,具有质的不同特点:第一,东北地区移民主要是华北地区破了产、在生死线上挣扎、低素质的农民,迁移动机只是寻找活路;而美国西部移民则是来自东部各行各业的冒险者和“淘金者”,以及不满旧秩序的欧洲移民,他们的迁移动机是追求致富的机遇和幸福。第二,昌五社区复制的是封闭的华北小农制度;而美国西部农业生产从一开始就置于资本主义现代市场关系之中。第三,昌五社区形成时期更具有“五方杂处”的人口学特点,但此后人口流动性和城乡人口转换率极低,甚至凝固不变;而美国西部人口则处于经常变动之中,城市化速度很快。正是由于存在上述多方面的差异,昌五社区及其具有相同历史的东北内陆农村地区始终处于低度发展状态。而寻求如何摆脱这种状况的途径及建立相应的制度模式无疑将是今后这一地区的人们所面临的一个主要课题。

#### 参考文献:

- 阿瑟·刘易斯,1989《二元经济论》,施炜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贝阿德·斯蒂尔普,1988《美国西部开发纪实》,张禹九译,光明日报出版社。  
顾宝昌,1992《社会人口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  
李德滨、石方,1987《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裘德·马特拉斯,1988《人口社会学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  
石方,1990《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孙占文,1983《黑龙江史探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T. W. 舒尔茨,1990年《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杨云彦,1994《中国人口迁移与发展的长期战略》,武汉出版社。  
肇东县志办公室,1985,《肇东县志》,黑龙江省出版总社。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责任编辑:张志敏